

[美]陈润成 李欣荣 编



张荫麟全集

中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3053785

C52
260
V2



张荫麟全集

[美] 陈润成 李欣荣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北航

C1661589

C52
260
V2

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

(自北京来稿)

梁任公考证《老子》一书(见《哲学杂志》第七期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谓为非与孔子同时之老聃所作。(原文结论甚笼统,惟中谓“仁义”两字为孟子专卖品,不应为老子所道,是认老子为在孟子之后。)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不揣鄙陋,谨述管见。

兹于讨论梁先生所考证之先,有应研究者二事。

(一)《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夫孔子以前,学术为王官专掌,安能有并行之道?然则孔子之为此言,当时必有与孔子并行之道可知。今考孔子之时,舍老子外,并无与孔子并行之道。若谓老子在孔子后,则孔子安得有是言?

(二)庄子学术与老子极有关系。而《庄子》书中所称老子,明明与孔子同时。《天运》、《天道》、《田子方》三篇所言,又非荒唐神怪,不近人情,安能因书中有寓言,而一概抹杀,谓为不足据?若然,则《天下篇》所举诸子亦属子虚耶?且信如梁先生所考,老子年代既约在庄子先后,庄子果何因而必提高孔子后百余年之人而为孔子先辈?如以为欲尊老子而抑孔子耶?然当时之人,谁不知老子在孔子百余年之后,而孰信其言者?庄子岂不知其言之必不能达其目的?譬如居今之世,有欲推尊一人者,而曰此章学诚之先辈也。虽至愚者不出此。况《天下篇》称述老子而赞之曰:“古之博大真人。”使老子与庄子同时,或去庄子未久,则庄子不当以之为古。

今就梁任公所考证者,一一讨论之。

梁先生第一证引《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汉孝文帝，假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而谓“魏为列国，在孔子卒后六十七年。老子既是孔子先辈，他的世兄还挨到做魏将，已是奇事。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孙蘧为汉高祖将，十三代孙安国当汉景、武时。前辈老子的八代孙与后辈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夫《史记》之文既自相矛盾若此，则老子为孔子先辈与《史记》所载老子世系，二者必有一真，必有一伪。果何据而谓《史记》所载老子世系必可信？如以为老子之后，至汉犹存，为史迁闻见所及，故较可信耶？然吾观《史记》疑老子为百六十岁或二百岁。夫使老子而为百六十或二百岁，则其五六代孙或至七代孙当及见之，与八代孙相去非遥。苟史迁闻见所及者而真为老子之后，则此等事而实有耶，当时不应有此疑惑。而无耶，当时尤不应有此等神话。更就梁任公以为老子在孟子后而考之。自老子之生至汉景帝时，至多不过百六十年至百七十年。以《史记》所载八代计之，每代相传年数，平均至多当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律以古人三十受室，似无二十至二十一岁而有子之理。况以孔子较之，自孔子之生至汉景帝时，凡三百八十四年，以十三代计之，每代相传之年数平均适三十年，与古人三十受室之事实相符。而较之老子每代相传年数，相差三分之一。信如梁先生所考，殊不近情理。

其第二证云：“孔子乐道人之善。（中略）何故别的书里头没有称道一句。墨子、孟子都是好批人，他们又都不是固陋，谅不至连那著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别的书不知何所指，如指六经耶，则六经皆孔子赞述旧典，何有称道老子之机会？如指《论语》耶，《论语》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记，（因书中有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事。）安能无遗漏。墨子去老子未久，且为宋人，而老子至关著书，以其时书籍传播之难，墨子之不及见亦何足异。至若孟子之未尝批评老子，更何足据以疑老子？考孟子略与庄子同时（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而孟子见梁惠王时，王称之曰叟，则孟子亦较庄子为老也）。《庄子》书中盛称老子，而孟子独不知有老子，非固陋而何？且《庄子》书中亦未尝一批《孟子》，然则《孟子》亦非孟轲之书耶？

第三证云：“就令承认有老聃这个人，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记他五段的谈话，比较可信。却是据那谈话看来，老聃是一位拘谨守礼的人，和那五千言精神恰恰相反。”考老子为周之史官，于周之典制知之最详，故孔子问之。《礼记》所记五段谈话，只可证明老聃为明礼，而不能谓其必拘谨守礼也。例如或就一反对耶教之人问《圣经》内事实，其人据实直说，然则吾人本此即可证明此人为信耶教者耶？

第四证云：“《史记》一大堆神话，什有八九是从庄子《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合而成。（中略）庄子寓言什九本不能拿作历史谈看待，何况连主名都不能确定。”梁先生所谓神话，未审定义如何。以吾观之，《史记》此传中为神话者不过二处：（一）“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岁。”（二）“或言儋即老子。”此外更无神话。而此二语与庄子《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至若《庄子》所载孔老时之可据，前已言之，兹不赘。又《庄子》书中所言，老聃自老聃，老莱子自老莱子，有何主名不能确定。惟《史记》疑老莱子、太史儋与老子是否一人耳。

第五证云：“从思想统系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中略）太不像春秋时人说。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影响，何以于《论语》、《墨子》、《左传》里头，找不出一点痕迹？”吾谓孔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继续其同方向之动者也。老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生反动力量者也。于思想统系上有可疑，若论当时人何以不受其影响，吾当仿梁先生问胡适语答之曰：古代印刷术未发明，交通不如今日之便，书之传播甚难。一个人的言论，好容易影响到别处。又况老子主出世，著书即隐，未尝栖栖皇皇，求行其道，与列国既无关系，《左传》何从称道之？墨子如上所言，既未必见老子之书，更何从生影响？《论语》既不能无遗漏，其不能寻出影响之痕迹，亦何足异？

第六证云：“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凡三处。这样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还有偏将军

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考楚于春秋已僭王号，拥兵强盛，时存迁鼎之心。老子楚人，受环境之感触，其用王侯、万乘之君等名词，亦理之常。若“仁义”二字，既非孟子所创，何得谓孟子以前不能有人将之对举？若“必有凶年”、“荆棘生焉”等语，皆极甚之形容词，即王充所谓增之，岂必实有其事？况老子之为此言，岂必感于当时？读《武城》“血流漂杵”之言，不更甚耶？又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言申不害之学本于老子。史迁之时，其书尚存，似当可据。然则老子必在申不害以前。即就申不害考之，申不害相韩，在三家分晋后二十五年，前孟子数十年，去马陵、长平之战百余年，更安能执此疑老子？至若上将军一语，其全文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上将军处右，偏将军处左。”此乃阴阳家之言，与老子学说风马牛不相及，且与下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此为后世方士附益，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已言之。）适相邻，其同为后世附益无疑，不能执此以疑老子。以上皆梁先生考证老子之失也。

（原载《学衡》第21期，1923年9月）

《清华学报》组织问题

举校所馨香以祝的宁馨儿——《清华学报》——竟有逆产之患，足足闹了半年，还没有出世。我们实在深为惋惜。我们希望当事人继续的努力做去，不要使这可以播扬校誉、提倡学术研究的東西，仅得昙花一现的空论。

但是举办学报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学报的主办者应该属于学生呢，或属于教员呢？我们经过一番考虑以后，却左袒由教员主办一说。因为：

（一）就学力一方面说，教员比学生较胜一筹。稿件的别择和改削，学生当然不如教员。我们欲求一较美善有价值的学报不能不使教员主办。

（二）照现在情形看，学报稿件的来源，决不能专恃同学的投稿。那么，主办者至少负一部分撰稿之责任。不然，学报便要夭折。但是我们处学生——尤其是清华学生——时代，是修学的时期，不是著述问世的时期。虽时或读书有得，可以公之于学术界，却不能“弊弊焉”以此为务。倘若学报由学生主办，那主办者便有顾此失彼之虑。

那主张学报由学生主办的言论，可以拿《清华周刊》第九次增刊所载王君的《改良清华计划大纲》里头所举的六个理由来做代表。他的理由据我看来，殊不充足。现在把他逐条翻驳如下：

（一）他说：“集稿较易。”我以为集稿的难易，全视乎稿件的来源。《清华学报》的稿件既有一定的来源，那么，集稿的难易，与主办者之为教员，为学生，有什么关系呢？

（二）他说：可以提倡研究学问精神。

（三）他说：可以提倡研究国文的兴趣。

但是学报由教员主办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利益。因为无论由教员办，由学生办，学报的本身，横竖是一样的。我们对于学报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决不会因为教员主办而打消研究学问的精神，决不会因为教员主办而减少研究国文的兴味。

（四）他说：可以得到经验。试问：办学报的经验，是否人人所必需？我们全体学生中有得这种经验的机会者几何？我们决不可因这小利便牺牲那大利。

（五）他说：教员方面，未必有人肯主办。我要问他：“子非教员安知教员之不肯主办？”办学报以砥砺学术，发扬校誉。他们教员，也是责无旁贷，自无不热心担任之理。

（六）他说：目下由教员主办未见得十分顺利。顺利不顺利，完全是将来的事。未审他根据何种观察，何种推论，而能前知？且如何而后曰顺利，如何而后曰十分顺利？教员主办未见得十分顺利，是否由学生主办，即可包得十分顺利？

据上面看来，学报当由学生办一说，已根本推翻了。学报之当由教员主办，可无疑义了。

总结

学报问题闹久了！本校同学及国内名流都很希望《清华学报》早日出现，所以本刊特先讨论学报问题，现在讨论这问题的文章已不少，很可以代表清华的舆论了。况且今年有梁任公先生、陈达先生、张鑫海先生……当本校的教员，学报问题，更有何难解决之处？我们希望评议会能从大处想，从远处想，早日把学报问题解决。

（原载《清华周刊》第286期，1923年9月20日）

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校补

梁任公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演讲附有《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一表。此表实为研究明末西方学术、宗教东输之重要资料。吾前尝发现其中可疑者三点，以质任公先生。先生复书谓：“该表采其自日本人著作，而其人又采自欧籍，并未注明出处。……其中讹舛，盖不免也。”顷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兹并录以质正于任公先生：

(一) 耶苏会教士在中国之著述，表内遗漏者有下列各书：

1. 《西琴曲意》一卷 利玛窦 Ricci (Mattes) 撰。四部已著录。(杂家类存目)
2. 《空际格致》二卷 高一志 Vagnoni (Alfonso) 撰。四部已著录。(杂家类存目)
3. 《火攻要》三卷 汤若望 Schall Von Bell 授，明宁国焦译。四部未著录。有《海山仙馆丛书》刊本。
4. 《坤輿外纪》 南怀仁 Verbiest (Terdinand) 撰。四部已著录。(地理类存目七)
5. 《天步真原》 穆尼阁撰，清薛凤祚译。四部已著录(天文算法类)，又有《守山阁丛书》刊本。
6. 《辨学》 此书任公先生于《近三百年学术史》内举之(第一讲第六页)。未审为何人所著。
7. 《玕衡抚辰仪记》 戴进贤 Kogler (Iguace) 撰。其文载于《仪象考成》及清《通志》。

8. 《日躔表》

9. 《月离表》

右二书皆戴进贤等所修，续于《历象考成》之后。（据《四部提要·历象考成后编条》）

（二）在中国之耶苏会教士表内遗漏者有下列二人：

1. 穆尼阁 即上述撰《天步真原》者也。其国籍及东来年均不可考。《四部提要》称其顺治中寓江宁，喜与人谈天算，而不招人入耶苏会云。

2. 纪利安 国籍及东来年不可考。康熙间为钦天监，五十二年尝造地平经纬仪。（据戴进贤《玑衡抚辰仪记》）

（三）表内以下列各书为利玛窦著述，均系错误：

1. 《徐光启行略》按利玛窦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据原表又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Ricci, Mattes 条所载同），而徐光启至崇祯间犹存。利玛窦安能及为徐光启作行略？

2. 《勾股义》按此为徐光启所自著。原书（《海山仙馆丛书》本）自序可按覆也。

3. 《浑盖通宪图说》按此为李之藻所著，其法出自熊三拔 Ursis (Sabathinus) 之《简平仪》，与利玛窦无涉。原书（《守山阁丛书》本）可按覆也。

（四）《崇祯历书》，表内列为孟三德 Sande (Eduard da) 著述。按孟三德卒于万历二十八年，据原表去《崇祯历书》纂修时已久，安能及预其事（参看《明史纪事本末》）。据《明史》及《四部提要》，纂修此书之西洋人有汤若望、罗雅谷 Rho (Giacomo)、龙华民 Longobardi (Nicolas)、邓玉函 Lereuz (Lean)，而均无孟三德其人。表内汤若望等各条下均不列此书，当补入。

（五）表内利玛窦所著书有《同文指算通篇》。按《同文指算》（《海山仙馆丛书》本）有《初编》及《通编》，均为利玛窦所授，不当独举《通编》。

（六）《坤輿图说》，表内列为南怀仁著述，又列为艾儒略著述。按艾儒略卒于一六四九年，南怀仁于一六五九年始来华（据原表），断无合著

此书之理。《四部提要》此书为南怀仁所撰，当从之。

(七) 数人合著之书，而表内仅归之一人，如：《西方要纪》乃利类思 Buglio (Luigi)、安文思 Magaehaens (Gaorirel de) 及南怀仁所共著，(据《四部提要》)。而表内仅归之利类思；《职方要纪》曾经利玛窦、庞迪我 Motel (Gacques) 及艾儒略 Aleni (Ginlio) 三手，(看原书艾儒略序)，而表内仅归之艾儒略。若此之类，似为未当。

(八) 表内戴进贤所著书有《仪象考成》。按《仪象考成》中有载戴氏之《玑衡抚辰仪记》。而此书非戴氏所著也。此书乃奉敕撰，成于乾隆十七年，其年戴已死六年矣。(据原表)

(九) 表内载利玛窦东来年在万历十一年。考《明史·外国传》言“利玛窦万历九年抵广州之香山澳”，今据改。

(十) 表内 Vagnoni (Alfonso) 有高一志、王丰肃二名。考《明史·外国传》言：“王丰肃后改名潜入内地。”岂高一志乃王丰肃之改名欤？若然则当先列王丰肃而后高一志，并当附注。

(十一) 表内罗雅各，《明史》及《四部提要》均作罗雅谷，当据改。

附录

前次所考者三事：

(一) 表内第八格列《诸器图说》为邓玉函所著书。按《诸器图说》所见及《守山阁丛书》本乃明王徵所自著。王徵尝往邓玉函，译《远西奇器图说》。而此书之作，则远在其获晤邓氏，从事翻译之前。原书王徵自序可按覆也。

(二) 表内以《远镜说》为孟三德所著书。原表第二格按此书《艺海珠尘》本题作汤如望撰(汤如望表内无其人)，想系汤若望或罗如望之误。

(三) 表内第十九格傅泛斋《续通志·艺文略》作傅泛际。

(原载《清华周刊》第300期，1923年12月28日)

介绍一部关于我国外交史的重要参考书

(《澳门纪略》李印光、□□□合著)

这部书著者是乾隆间人，都在澳门做过官的。书虽寥寥两册，却曾经两手，历时十余年，其慎重可知了。

书内述明末清初西洋人在我国的情状甚详，又载了好几篇明末诸臣关于对付西洋人的奏疏，都是我国外交史上所不可多得的材料。又葡萄牙人所以得到租借澳门的经过尤有价值。外国人说葡萄牙所以得借澳门，是因为帮助我国剿海寇有功（参看 *International Eucyclo Pedia*, Maccas 条）。但是书所载却大不然。读者如欲知其详，请看原书，恕我这里不叙述了。又最要注意一事：书中所称佛郎机乃是当时西洋人的别名（《明史》外国传亦然），若拿作 France 看，则一塌糊涂了。关于这事，余别有考，现在不能详说。读者如欲略知其故，可参看《图书集成》边裔与佛郎机部最末一条。读此书时，至好与《明史》外国传作参考。

（原载《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8期，1924年1月，署名“荫”）

编辑室共话（国情述要栏）

本栏上学期之“国情报告”改为今名，匪惟名更，实亦因之而异。其改革之方针，已详二八五期，兹不赘。半年以来，其能满意的实践与否，惟读者批评之。又自本学期始，本栏篇幅亦增前三倍。

原定本栏之分类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其他，后以经验之所，而知文化者，社会之共业，其成绩决非每六七日所能计算。换言之，即吾侪决不能为每六七日之文化史。是以将此类取消，其偶有关于此项之事实，则附之社会一类之后。

半年以来，国事日非。北京为魑魅之窝，报章既多忌讳，本栏亦不能尽言，是则同人之所深歎而无可如何者也。

社会方面，拟注重统计。惟以资料之缺乏，方法之不善，故无成绩可言。然窃信此为极好之工具，而深望后继者之加意焉。

以同人等一得之愚，窃以为本栏此后有应注意者数事：

一、注意群众方面。社会、经济之必须从群众观察无待言矣。就政治言，若以报章纪载之标准为标准，以现在言，则盈篇累幅皆盗国之行、分赃之为而已，走狗之摇尾贡媚而已，猪仔之嗷嗷器鸣而已。此等秽迹，果足以为政治之原动力及政治史之惟一资料乎？曰：否，在群众。故政治一类对于上述秽迹，叙述当略；对于群众方面，叙述宜详。

二、注意对外方面。大同之梦，去实现之期尚远，夫人知之。对外问题，诚我国今日之重要之问题。故本栏宜注意此方面，以促国人——尤其是：海外受外国化的留学生之觉悟而筹对付之方法。

三、注意边疆方面。边疆各地，我们久已度外置之，外人遂得暗中侵略取携，凡我国人，孰不心痛。在今日中国，言政治者，统计边裔为重

要问题；言经济者，垦殖边地为重要问题；言改造社会者，同化边裔为重要问题。而受国家无上恩惠之留学生，对于此等国命所关之边事，尤不容不悉。故本栏宜注意此方面。

抑尤当申言者，吾侪非谓：本栏当仅从事此三方面：乃谓当对于此三方面特别注意耳。是否有当，惟将来主此事者酌而裁之。

（原载《清华周刊》第302期，1924年1月11日）

钱大昕和他的著述

“戴编修震尝语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微（钱大昕字）为第一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钱詹事大昕记碑传集》卷四九）

“乾嘉诸儒以东原、竹汀（大昕别号）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而湛深不逮。”（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

我们读此，可知钱大昕在清代学术界的位置早有定评，用不着“予小子”再多说话。至于他治学之合于科学方法，尤近日学者所极力表彰。简单说一句：他是一位“科学的”史学家、小学家——音韵和训诂的考证家、天算学家、金石学家、地理学家；而他的贡献都是在考古方面。就这方面说，清代的汉学者，恐怕没一个比得上他。（他的词赋也是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但这不是他毕生用力所在，现在且不说。）我以为这一位学者，实在有介绍的价值。所以《周刊》书报介绍主任陈君要我为该栏做一篇文章，我就答应了做这篇。因为我个人学识浅陋，且时间匆促，这篇文章恐怕对不起读者，更对不起“钱先生”吧！

一、略传

“闲话少谈，言归正传”：

钱大昕字晓微，一字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人。生于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卒于嘉庆九年（一八〇四），他的一生正当清代“歌舞太平”之世，汉学“当阳称尊”之期。他生而颖悟，少时有神童之称。十五岁便中了“秀才”。时紫阳书院院长王峻闻其名，召至院里，试以《周

礼》、《文献通考》两论；他下笔千言，悉中典要，院中名宿大为佩服。乾隆十四年高宗南巡，这时他才二十二岁，到行在献赋，召试，赐举人，以内阁中书补用。明年他便入京就职。过了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寻擢侍讲。后来升到詹事府少詹事，所以后人称他为钱詹事。他在京师足足住了十九年，这是他一生学业成就的关键。因为在这时得读翰林院的藏书，得交当时的有名学者，他的天算学和元史的研究，都是在这时成功的。他离京师后连接做了山东、湖北、湖南、浙江、河南的主考官，后来奉命提督广东学政。次年他的父亲死了，这时他已经四十九岁，方才除了孝服他的母亲又死了。自是以后他便不再出做官。历主江苏钟山、娄东、苏州紫阳诸书院，一面讲学，一面著书。他的有名著作——《二十二史考异》，便在这时完成。七十七岁那一年，他便死在紫阳书院里。他死的一天还和他的学生们口讲指画，谈笑不辍云。他生平的学友，如戴东原（震）、段若膺（玉裁）、梁耀北（玉绳）、洪稚存（亮吉）、王凤喈（鸣盛）——他的妻舅、孙渊如（星衍）、卢弼弓、袁简斋（枚）等——都是一时知名之士，皆曾与他通书论学，载在文集中。

他的弟弟大昭和他的侄儿塘、儿子东垣都是笃志古学，很有建树的。他的弟子很多，在紫阳书院的时候，门下士积二千余人。但最能传其学的，要推李锐了。

他所撰著和参预纂修的书，现在考出的共四十六种。

长沙龙氏刻本《潜研堂全书》仅收入他所著的书二十三种。其余有的是原来未刻的，有的是刻了而不流行的。现在将所考分类述出，每类仍以成书的先后为次，没有年代可考的列在后面。（其书收入《潜研堂全集》中者以“○”为记。）

二

1. 大昕所撰著的书：

- (1) 史学类
- 《补元史氏族表》三卷○

《补元史艺文志》四卷〇

“大昕向在馆阁，留心旧典。以洪武所葺《元史》冗杂潦草尤甚，拟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之稿，当留篋中。”（《艺文志》自序）盖二书皆“旧史所未备，先生特补之”。（《艺文志》黄钟跋）

《氏族志》一书，为其所拟新元史的最重要部分，因为“元之蒙古‘色目人’命名多溷，非以氏族晰之，读者茫乎莫辨，几如瞽者之无相。……（无表）先生属稿于乾隆癸酉（十八年，一七五三），成于庚子（四十八，一七八〇），几及三十年。……广搜博采，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等书；考其得失，审其异同，一一表而出之。然后昭然如分黑白矣”。原书黄钟跋，是书初刊于嘉庆十一年。

《艺文志》一书，取元代“文士撰述，录其都目，以补前史之阙；而辽余作者，亦附见焉”。这书又得黄尧圃“纠其踏驳，证其同异”。嘉庆五年刻于吴郡（原书自序）。

《元史纪事》四卷

《元史稿》一百卷

荫谨案：右二书《潜研堂全集》未收，且不见于目录。（《潜研堂全集》目录中凡未刊入之书，亦列其目。）前一种载于《钱詹事大昕记》（以下省称《钱记》，《碑传集》卷四九），未审已刻否；后一种见于郑文焯《南献征遗》，未刻。（《国粹学报》第六年第四册。）《新元史》一书，大昕自云“次第属草，未及就绪”。（见前引）而其弟子黄钟于先生卒后有云：“先生尝欲别为编次（元史）……稿已数易，而尚未卒业。”（《元史·氏族志》跋）则郑氏所见之《元史稿》，当即此稿矣。而《钱记》云“大昕……重修《元史》后恐有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其言信否，未可知。然可见其《元诗纪事》，盖取材于《元史稿》也。

荫又案：新《元史》的研究，清末极盛，魏源、柯劭忞等极有成绩。而最先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要推大昕了。先生于此业用力甚劬，但是对于后来清末新末《新元史》的研究，似乎无甚影响。《元史稿》未有刊本无论了，即《氏族》及《艺文》二书，现在柯氏的《新元史》中，尚未